

国大与《柳叶刀》报告：不能只依赖传统技术模式 各国须构建全方位大流行病应对机制

由国大与《柳叶刀》联合成立的专家委员会指出，冠病疫情暴露了传统备灾模式的失败。大流行病的应对表现应反映社会上下的综合能力——在保护民众福祉的同时，政府仍能有效做到预防、准备、应对、恢复和纠正疫情的负面影响。

杨漾 报道
yangyang@sph.com.sg

面对未来可能席卷全球的大流行病，单凭制定计划已不足以保护民众。一个国家真正的应对能力，除了技术与物资，更取决于平日所积累的跨国互信与社区参与，包括政府对不同群体所给予的保障。

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国际权威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联合成立的专家委员会，汇聚全球41名跨领域专家的研究、20个国家的冠病抗疫经验，耗时三年完成报告，呼吁各国政府力从传统的“技术备灾”（technical preparedness）模式，全面转向构建“360度大流行病应对能力”（360 degree readiness）的全方位模式。

委员会指出，冠病疫情暴露了传统备灾模式的失败，纸面上的应急计划未能为民众提供良好的保障。成立专家委员会，正是为了正视这一痛点，在下一场大流行病来袭前，协助各国找出并弥补机制漏洞，有效保护民众。

“备灾”关注的是计划和能力是否存在；“全方位应对能力”则检验这些资源在危机高压下能否发挥作用。委员会指出，大流行病的应对表现反映了社会上下的综合能力——在保护民众福祉的同时，政府仍能有效做到预防、准备、应对、恢复和纠正疫情的负面影响。

为此，报告提出多项建议，包括各国必须从技术备灾转向全面应对；加强对疫苗接种、分配和使用的信心；修复脆弱的社会

体系而非为弱势群体贴标签；以及在日常基础上建立互信并有效沟通等。委员会因此制定了一套行动计划，鼓励各国政府落实相关建议。

这个专家委员会的全称是：“通过制度、动员社区与公平，实现大流行病应对能力”（Pandemic Readiness through Institutions, Mobilising Communities and Equity），反映了委员会认为要实践大流行病应对工作必须具备的三大要素。41人的全球专家团队中，共有16人来自国大。

委员会星期一（9月21日）在联合国大会期间，正式发布并呈现这份报告。

我国应对冠病时表现亮眼 成推动全球倡议关键成员

国大副校长（全球健康）、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张毅颖教授是专家委员会的其中一名成员。他接受《联合早报》访问时指出，我国在冠病应对方面表现亮眼，因此成了推动这项全球倡议的关键成员。他说，我国的“抗疫防线”已基本就位，足以应对未来大多数可能危害民众的疫情。

张毅颖强调，疫苗接种仍是防疫最关键一环，但获取疫苗不仅需要平日积累的国际互信，更须强化区域制造能力。目前，中国、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已具备大规模生产优质疫苗的实力。

“随着区域制造中心逐步建立，它能有效打破供应链高度集中的局面，确保各国在关键时刻迅速获取资源。”



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张毅颖教授说，我国在科研、政策、治理，还有民众信任度方面，已创建了一张安全网。图为2021年12月3日上午，住在马西岭的年长者前往智能保健流动诊所接种疫苗。（档案照片）

专家：我国具备安全网 可应对大多数疫情

国大一柳叶刀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张毅颖直言，对抗冠病疫情所带来的最大启示，就是认清“纸面上的准备”与“保护民众”之间，其实存在巨大落差。要填补这一空白，单靠政府的指令并不够，关键在于社会互信与社区的应变能力。

也是国大副校长（全球健康）、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张毅颖教授，以新加坡为例指出，我国在科研、政策、治理，还有民众信任度方面，已创建了一张安全网，而且无论是检测还是追踪技术，我国早在冠病疫情前就已经具备全球顶尖水平。

然而，在面对下一场大流行病时，最大的考验是这套体系能否迅速保护民众。

被问到新加坡是否已为下一场疫情爆发作好充分准备时，张毅颖说：“我们已具备所有必要条件。但下一场疫情的应对，取决于它传播得多迅速、病毒有多容易被发现，以及致死率多快。如果出现一种极难发现、传播迅速且致死率很快的疾病，那么新加坡同样也会很脆弱。但在那之外，我们已经建立了必要的安全网，足以在未来应对大多数会危害我国人民的疫情。”

疫情期间年长国人最受影响

为探究疫情中受影响最广泛的是哪些群体，专家委员会评估了多国案例，包括新加坡的年长者、泰国的残障社群，以及土耳其的医护人员等。

张毅颖指出，新加坡的案例之所以聚焦年长国人，是因为这个群体在受感染后更易引发并发症，加上年长者大多原本在社交上就相对孤立，疫情期间的行动管制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。

“人们总以为备灾完善的国家能照顾好所有国民。但事实证明，每当疫情爆发，年长者与慢性病患者等群体总是首当其冲。”

张毅颖说：“社会中只要有一个群体被遗漏，随时可能成为疫情扩散的缺口。因此，推行抗疫政策绝不能缺少基层社区的参与。当年我国应对客工宿舍疫情时，正是借助客工领袖去沟通，才让防疫措施顺利推行。”